

数字贸易生态的组织机理与建设路径研究

肖旭¹, 马泽伟¹, 黄鑫²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100070;

2. 中关村产业发展研究院, 北京 100080)

摘要:数字贸易的出现重塑了全球贸易模式,为各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借助理论分析的方法,从活动形式上对数字经济时代贸易活动的特征进行了梳理总结。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发挥了数据和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全方位地推动了贸易活动变革,呈现出交易主体多元化、定价机制透明化、支付系统统一化的新特征。研究表明,数字贸易生态的组织机理包括平台经济模式,标准化体系构建,全球资源配置与集聚发展,塑造区域性、综合性的比较优势。研究认为,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机遇,中国应积极应对贸易数字化趋势,采用适度超前发展基础设施、健全标准化机制、完善配套条件和人才队伍、推进贸易示范区试点、参与全球贸易规则博弈的建设路径,稳步建设数字贸易生态,为打造贸易强国奠定扎实的技术基础和制度基础。

关键词:数字贸易;数字商务;贸易生态;数字贸易强国;组织机理

中图分类号:F7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4)06-0073-14

Research on the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digital trade ecosystem

XIAO Xu¹, MA Zewei¹, HUANG Xin²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2. Zhongguancun Industrial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80, China)

收稿日期:2024-08-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77)

作者简介:肖旭(1988-),男,山西孟县人,讲师,管理学博士。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trade has transformed global trade patterns, injecting new vitality int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worldwide.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examines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e activiti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ity form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digital trade, empowered by data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has driven a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e activities, characterized by diversified transaction entities, transparent pricing mechanisms, and unified payment systems. The study identifies the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underpinning the digital trade ecosystem: the platform economy model, standardiz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glob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agglomer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regional and 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light of the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the new wave of global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China should proactively embrace the trend of trade digitalization. Proposed pathways include advanc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enhancing standardization mechanisms, strengthening supporting conditions and talent development, promoting pilot trade demonstration zone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formulation of global trade rules. These steps aim to steadily build a robust digital trade ecosystem and establish a solid technical and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positioning China as a global trade leader.

Key words: digital trade; digital commerce; trade ecosystem; digital trade power;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加快了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也推动了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的过渡。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新兴形态,是传统贸易活动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延伸,在贸易成本优化、业务环节精简、个性化需求凸显、知识传递和信息扩散等方面都拥有更为明显的优势^[1]。在全球经济增速减缓、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现实趋势下,数字贸易克服了时间、空间和地理因素的约束,表现出较强的增长活力。根据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和国

际贸易中心(ITC)联合发布的《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2024》,从 2021 年至 2023 年,全球数字贸易的总额由 6.02 万亿美元增长至 7.13 万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 8.8%;全球数字贸易占国际贸易总体规模的比重也由 19.6% 上升至 22.5%,年均增速达 6.2%^[2]。随着全球数字化发展进程持续推进,数据流通逐渐打破部门壁垒,数字化手段的普及与推广显著地提高了贸易合作效率和组织效能,串联起互联互通的网络组织架构。如今,数字贸易的开展越来越依赖网络平台力量,在增进相关主体之间技术连

接的同时,也构筑起互联互通、互信互利的数字贸易生态。

近年来,受到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出口份额有所下降,但仍然是最大的商品出口国。数字经济浪潮加快了全球要素流通和集聚,倒逼中国传统比较优势向着贸易竞争优势进行转变^[3]。根据商务部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2024》,2023 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3 859亿美元,同比增长 3.5%^[4]。党的二十大提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加快数字化转型,继续巩固商品出口优势,深入推动数字贸易做大做强,增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贸易循环和资源联动,是中国建设贸易强国的必由之路。国外较早提出的数字贸易概念学者认为,数字贸易是指通过互联网等电子化手段传输有价值产品或服务的商业活动,数字产品或服务的内容是数字贸易的核心^[5]。国内学术界对于数字贸易领域的讨论从 2012 年左右开始增加,早期的研究就数字贸易的定义、特征及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讨论^[6-7]。但由于概念界定不清晰等问题,学界针对这一相关领域的研究与讨论并未得到有效开展^[1]。至今国内学术界关于数字贸易生态的文献也较少。本文在梳理归纳数字贸易的时代特征基础上,揭示数字贸易生态的组织机理,探讨中国数字贸易生态的发展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结论丰富了国内数字经济情境下的理论研究,有助于为中国建设贸易强国

提供思路启发与借鉴。

一、数字经济时代贸易活动的新特征

根据《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2024》,数字贸易是指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服务为核心、数据订购与交付为主要特征的贸易,目前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的新增长点^[4]。区别于传统贸易活动,数字贸易广泛地嵌入了数字化元素,知识、信息等无形资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活动形式上看,数字贸易发挥了数据和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全方位地推动贸易活动变革,在交易主体、定价机制、支付体系 3 个方面都表现出新的特征。

(一) 交易主体多元化

全球数字贸易快速发展,让更多的个体有机会参与贸易活动,交易主体趋于多元化,涌现出 B2C、C2C、B2B、C2B、C2M 等模式,提高了产品供给的有效性。

第一,数字化连接减少了冗余、复杂的中间环节,实现供求双方之间的直接对话与密切合作,增进了供需匹配。对于生产者而言,可以不再困惑于繁琐的资质材料认证审核,而将主要资源投入到设计和开发环节,致力于打磨产品品质、优化使用体验,3D 打印、电子书、数字音乐等新的产品形式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个性化价值,更好地应对千人千面的需求趋势;对于消费者而言,可以将具体诉

求直接传递给生产者,获得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在使用过程中通过与生产者的持续互动,形成正反馈效应,加快产品性能的迭代升级。

第二,数字化连接实现价值碎片化供给,降低了中小企业在传统贸易活动中所面临的规模、信息、区位、供应链等壁垒和准入成本,极大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贸易参与度。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世界贸易报告 2016》,在传统贸易活动中制造业中小企业直接出口占总销售额的比重约为7.6%,大型企业占比为14.1%,大多数国家有出口行为的中小企业占比仅有2%—28%^[8]。一项针对越南生产企业的研究发现,中小企业参与数字贸易,使得生产效率提高了75%以上^[8]。数字化转型从产品竞争力、市场布局、运营效率3个维度为企业提供赋能,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在贸易中的经营能力和竞争力^[9]。除了中小企业之外,市场上大量的潜在商户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同样可以通过贸易平台向消费者提供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进一步丰富了产品价值和服务价值的供给。

(二) 定价机制透明化

成本加成情况直接决定着产品定价,是影响供需匹配的关键因素。传统贸易活动成本主要分为两类,即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成本和制度、操作等人为因素成本。如今,数字化连接贯穿了产业链、供应链的各个环节,计算机对有关成本的具体数据进行实时记录,并反馈给所有交易主体,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一定缓解。算法模型依托于智能化的程序设计,能够连续跟踪物流状态,逐渐被应用于

数据采集、清洗、挖掘等价值链各个步骤管理,数据利用效率得到大幅提高,也使得过去那些不容易被掌握的信息进入了人们视野。信息完备促进了定价机制透明化,让市场竞争的焦点逐渐转向于追求质量和效率的双重提升,供求双方都有机会从更加合理的产品价格、更加丰富的购买选择、更加适配的产品质量以及更加多样化的产品种类中获益。

在通过线上交流而开展的数字货物贸易中,生产者可以及时发布产品的最新信息,根据算法模型基于现实场景,对成本变动情况进行模拟预测,对标竞争对手,改进后续业务流程;消费者亦可以以较低的搜索成本,较为全面地了解价格结构,通过多维度综合比较,做出恰当的购买决策。

在以通信网络为载体的数字服务贸易中,数字化产品以零边际成本实现快速复制,以较快效率、较低成本进行推广和维护,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可搭建起线上顾客群体。生产者可以在产品中融入更多的服务化元素,采用SaaS模式嵌入消费者的日常使用过程,在发现问题之后及时提供技术支持和修复方案,缩短服务距离。每一次改进都会留下清晰的数据痕迹,便于消费者随时了解服务参数变更,客观地评估新功能和成本加成情况。

(三) 支付体系统一化

传统贸易活动中,交易双方在支付结算时必须解决好权益转换、外汇兑换等问题,权益认证难度、汇率变动都会增加交易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如今,数字贸易所使用的电子化交易是以数据要素流通作为基础,

运用多项技术组合对交易环节形成有效监督,强化对相关主体的激励和约束,促进产品价值的转化与交易,进而协调多方利益。这种电子化手段对交易标的权益和价值进行标记,可以及时将汇率变动情况融入计算模型,减少了交易双方的沟通成本和交接成本。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3年规模以上相关企业的互联网业务收入为17 843亿元,同比增长6.8%,全国网上零售额增加至15.42万亿元,同比增长11.0%^[10]。

随着越来越多新兴电子交易技术的应用,贸易往来频繁的多方之间也更加倾向于组建数字贸易联盟,立足于贸易一体化的发展理念,在内部推出统一化的权益认证工具,减少外汇结算的频率和频次,进一步促进标的流转速度和交易效率的提升。其中,区块链构成了支付体系统一化的核心技术,能够避免对权益认证的人为主观篡改,并且可以对涉及权益转换的流程和主体进行分布式监测和链条式追溯。支付体系统一化促进了标准统一,有助于提高交易主体之间信任感和认可度,打造一站式应用方案,保障贸易活动的安全合规。

二、数字贸易生态的组织机理

数字贸易的出现重塑了全球贸易模式,为各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数字贸易的核心在于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即以数据流带动物流、信息流以及资金流的同步联动,利用数据要素传递的实时信号来提高其他生产要

素的整体配置效率^[11]。数据类商品作为信息产品虽然拥有较高生产成本,但其复制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2]。这一经济特征为信息产品的流通创造了天然的优势。其间,数字平台作为主要的数字贸易载体,在为各类主体提供业务交易场所的同时,还扮演着要素融合、资源集聚、价值分配等重要角色。数字贸易所表现出的新特征,尚不足以颠覆传统贸易活动,但是已经对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定和分析思路提出了挑战^[13]。为了加快推动数字贸易发展,需要经济学界结合数字经济规律,重新认识贸易活动的规律和特征,对相关理论进行必要创新,更为清晰地揭示数字贸易生态的组织机理。

(一) 数字贸易平台经济模式

数字技术重构了传统贸易模式。其中,数字化平台是数字经济最主要的载体和最具代表性的商业模式,拥有鲜明的独有特性^[14]。利用平台经济模式运营的企业在过去十多年中实现了大跨步式的发展,在交通、能源、金融等全球重要领域中逐渐扩大影响力。基于平台模式的数字贸易生态不断发展完善,并在此过程中逐步重塑全球贸易格局。

直观地说,一个平台可以是硬件与软件的任意组合,允许两方或多方接入并提供相应规则与标准,平台中的创新者与其补充者就共同构成了一个初步的生态系统^[15]。“平台”一词的释义与用法有很多,本文所强调的平台是指商业贸易中的平台,以及平台所代表的经济模式。起初,企业建立“平台”模式旨在通过降低工作流程中的冗余来降低成

本,例如,传统的汽车行业和飞机行业中,具有影响力的品牌公司开始建立平台模式,进行系统集成以优化生产与供应链,实现成本节约与效益提升,目前已经逐渐发展为完善的生态系统。如今,数字技术赋能平台经济模式,其内核是借助互联网对拥有的数据(包括私人数据)进行捕捉、传输及货币化,使平台经济模式创造更多价值^[16]。例如亚马逊、苹果、阿里巴巴等平台型企业,借助数字平台,其业务规模与用户群体在过去10年间得到快速增长。

多边市场是数字平台的基本特征,能有效匹配市场上的买卖双方、协调各方间的关系是数字贸易平台创造价值的主要形式之一^[17]。当客户关系人员、供应商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中时,业务交易与沟通互动的频率会显著上升,得益于网络效应的正向循环机制,越来越多的客户开始使用平台,该平台就能创造更多价值,类似于亚马逊董事长贝索斯所称的“亚马逊飞轮”效应。平台公司最终会寻求建立一个整合的全球生态系统,使网络效应最大化,并吸引来自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用户^[18]。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带来的便捷性进一步减少了交易双方的摩擦,使得多方之间可以更加便利地展开深入合作。

数字平台具有熊彼特“破坏性创新”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创新平台是数字平台创造价值的又一种主要形式^[19]。创新平台的本质在于数字平台提供了一个中心枢纽,企业和用户可以围绕这个枢纽共同或单独地进行产品、服务创新,以更有效地吸引潜在用户,

逐步形成围绕平台的创新生态,从而增加整体系统的价值。苹果公司旗下的插件生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大量的第三方开发者在这一平台上进行创新,为平台 and 用户带来了丰富的产品和服务价值。另外,平台管理者也需要提供合适的接口与激励手段,来保持整个生态的活力。平台管理者的活动表明了其对未来生态系统和数字市场的愿景,包括创造价值的形式等,当互补者和消费者认为这些信号有益时,他们就会选择参与平台,从而逐渐形成平台生态系统。

(二)融合发展视角下标准化体系建构

跨境数据流通逐渐成为贯通数字贸易相关主体的重要线条。根据维奥思社(We Are Social)公司发布的《数字2024:50亿社交媒体用户》,到2024年初,全球的独立手机用户数量为56.1亿,全球的互联网用户数量为53.5亿^[20]。全球互联网与电信行业的迅猛发展为大数据的使用与流通带来了指数级的增长。在互联互通的数字背景下,一国经济的数字化和世界经济的数字化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在同一个国家内的数据流动与跨境数据流通并没有太大区别,几乎所有的跨境贸易都存在数字元素,数据的全球流通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21-22]。

对于企业而言,数据流通带来新的贸易与发展机会。传统贸易模式下,受制于时间、地域、交易周期等因素,资源在各主体之间的流动阻碍重重,生产与交易效率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在数字经济中,数据可以是产品,也

可以用于生产数字产品和服务,跨境数据的流动极大地增加了全球范围内可贸易产品和服务的数量,进而重塑国际贸易格局。另外,对数据的分析有助于企业更好地了解国际商业环境和形势,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以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

数字贸易是跨境电子商务的高级存在形式,原来的电子商务规则也逐渐发展至新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23]。构建一个全面、统一且高效的数字贸易标准化体系能够促进全球数据的安全、合法流通,提升国际贸易的效率和透明度,保障各参与方的权益。虽然世界贸易组织推动制定了一些数字贸易的标准问题,但是随着全球范围内跨境数据流动规模的扩大,这些相关标准开始显现局限性^[24]。数据隐私与保护问题是数字贸易标准化体系的核心要素之一。2007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针对跨境数据流动问题创立了跨境隐私的规则框架,以支持建立整体的数据跨境机制。2018年欧盟通过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这一个人数据的保护法律文件。国际数字贸易中的协作、公平性问题也为构建数字贸易标准化体系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例如,欧盟通过制定《数字市场法》(Digital Market Act)和《数字服务法》(Digital Service Act)规范数字贸易,推动区域内标准的统一。联合国通过设立互联网治理论坛(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来推动多方协作,制定网络和数据流通标准。全球数据流通背景下的数字贸易标准化体系建设是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过程,目前国际规则的不完善以及由此形成的各国贸

易壁垒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字贸易生态的发展。

(三)全球资源配置与集聚发展

在全球化的经济结构中,数字贸易正在成为推动产业资源全球配置的重要引擎。其核心是利用网络平台的无边界特性,实现资源跨境流动的最优化,从而促进全球产业链的高效整合与协同发展。数字贸易通过打破传统贸易模式的限制,为技术、信息和人才等资源的全球流动提供了无缝的平台。这种流动性不仅加速了全球产业的结构调整,也使得资源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更加灵活地被配置到最能发挥其价值的领域。数字贸易对全球产业资源配置的影响体现在全球经济的动态优化与创新驱动发展两方面。一方面,通过数字贸易平台,企业能够实时捕捉全球市场动态,快速响应消费需求变化,这不仅提升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加快了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步伐。另一方面,数字贸易通过促进跨境数据流动和信息共享,加强了全球范围内的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效应,为全球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提供了有力支撑。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新型的全球经济活动形态,正在深刻影响着全球产业资源配置的格局,推动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高效、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

数字贸易发展同样催生了资源集聚发展的新格局。在数字经济的驱动下,资本、技术、信息以及人才等要素趋向于流向那些具备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创新环境的区域,数字化平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形成

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在知识密集型和创新驱动型产业领域更为显著。这种集聚效应不仅加速了产业升级,还促进了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迭代。与此同时,数字贸易成为技术创新传播的重要媒介,企业之间的协同作用 and 创新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激发和提升,对于推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四) 塑造区域性、综合性的比较优势

全球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贸易规则决定了数字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发展,也决定了各国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的比较优势^[23]。在数字贸易的推动下,区域性与综合性比较优势的塑造共同构筑起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通过数字化转型,地区可以充分发挥其独特的产业基础、地理位置、文化特色和政策环境,将这些潜在的优势转化为区域特色鲜明的产品和服务,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比较优势。例如,某个区域可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或者深厚的文化遗产,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的推广,可以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吸引全球消费者。同时,区域内部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综合多方面的优势,构建起更为全面的竞争力。

此外,综合性比较优势的构建要求区域在巩固自身特色的基础上,积极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通过数字贸易平台与其他地区进行资源、技术、人才和信息的深度整合与互补合作,

实现产业生态的多元化和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例如,一个区域可以专注于发展高科技产业,而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数字贸易外包给成本较低的地区,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样的策略不仅提升了区域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也为区域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而为全球经济的多样化和均衡化贡献重要力量。

区域性比较优势的塑造有助于区域发挥特色和优势,而综合性比较优势的构建则有助于区域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发展。通过这样的双向努力,数字贸易能够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展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和潜力。

三、中国数字贸易生态的建设路径

数字贸易为经济增长、社会就业、消费者福利提升、中小企业发展等带来新机遇,而数字贸易红利高低还取决于一国的综合实力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25]。近年来,美国、欧盟、英国、日本等国家纷纷加大数字贸易投入力度,旨在从技术研发、投融资服务、配套设施、贸易环境、贸易规则等方面夯实贸易基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数字贸易存在结构性差距,尽管拥有规模和 B2C 业务的双重优势,贸易竞争力和平台国际化水平均有待进一步提高^[26]。从统计情况来看,中国数字贸易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数字化产出方面,但是核心中间产品与全球领先水平之间还存在差距^[27]。数字贸易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众多领域的不同主体。对此,中国要尽

早规划和布局,协同、有序地推进数字贸易生态建设。

(一) 适度超前发展基础设施,扩大网络连接

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网络接口的扩大是布局数字贸易生态与提升市场活力的基础。当前,中国正处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通信与互联网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要满足现有的市场需求,更要预见未来的发展趋势,这要求在网络覆盖、数据处理能力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进行超前规划和布局。具体而言,需要从网络覆盖面的广度和深度入手,确保不同区域间网络的无缝连接,不仅包括在城市中心区域部署高速的5G网络,更要在偏远地区进行互联网规划与建设。通过卫星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消除数字鸿沟,让每个角落的商家和消费者都能享受到数字贸易带来的便利。此外,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日趋广泛,数据中心和云服务平台的建设也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基础设施将成为数字贸易生态的坚实后盾,提供稳定可靠的数据存储、处理和分析服务,保障交易的实时性和安全性。

基础设施的超前发展还需与时俱进,紧跟技术演进的步伐。例如,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链在边缘层、网络层、平台层和应用层的4个层面中,网络层拥有优势,其他层面均面临缺乏自主技术等问题^[28]。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数字贸易将更加依赖于设备的互联互通能力,这就要求相关的网络基础设施能够支持更多类型的设备连接和更高

频率的数据交换。除了硬件设施的建设,软件资源的开发也同样重要,有关部门需要加强对开源技术的支持,推动开放平台的建设,促进技术共享和创新协同。通过建立全球性的数字创新平台提升中国数字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并为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因此,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网络扩张战略对于加快中国数字贸易生态的成熟与完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石^[29]。

(二) 持续健全和推广标准化机制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贸易已成为新型贸易方式的代表,数字贸易生态的构建离不开一套完善、统一的标准化机制。这一机制需要涵盖数据的标准化、交易流程的标准化,旨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增强消费者信任,从而推动数字贸易的发展。近年来,中国的信息化标准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国际标准工作中的参与度持续提升,但仍存在网络跨领域的统筹协调不足,国际标准工作影响力不足,专业水平、参与深度、贡献质量有待提升等挑战。为持续性健全信息标准化工作,需加强数据的标准化工作。数据流通是数字贸易生态的基石,其标准化是提高交易效率、保障信息安全的基础。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组织的活动,推动国内外数据标准的协调一致,特别是在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加强与国际标准的对接和协调,推动标准的国际化,形成数字贸易规则“中式模板”^[30]。此外,对于交易流程的标准化,需要建立一套包括电子合同签订

订、支付结算、物流追踪等在内的统一流程标准,以减少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同时,服务标准化也应得到重视,即通过建立统一的服务质量标准,提升消费者体验,增强市场信任度。在推进标准化工作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引导和监管作用,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企业参与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同时加强对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确保标准化机制的有效运行。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标准化机制也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例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对数据处理和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对数据标准和安全标准的更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31]。因此,建立一个动态更新机制,对标准进行定期的评估和修订,是保障标准化机制长期有效运行的关键。通过持续健全和推广标准化机制,确保数字贸易生态的持续健康发展,加快数字经济整体进步,从而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领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三) 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与人才队伍建设

数字贸易生态的发展不仅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扩张,更离不开健全的制度保障和专业人才队伍的支撑。着手完善数字贸易的配套制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以促进中国数字贸易生态的全面繁荣。

第一,完善的配套制度是数字贸易健康发展的法治保障。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中国面临着数据治理、跨境电商法规、知识产权

保护等方面的挑战。针对这些挑战,需要构建一套与数字贸易发展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电子合同认证以及反垄断监管等领域的立法。同时,建立跨境电商交易的标准化流程,优化关税征收、物流配送等环节,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增强市场活力。此外,应与国际规则接轨,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第二,人才队伍建设是提升中国数字贸易竞争力的关键。数字贸易不仅要求从业者具备传统贸易知识,更需要掌握数字技术、网络安全、国际法律等多维度技能。目前阶段尚缺乏既懂贸易又懂数字化的复合型专业人才^[32]。因此,高等教育应加强与产业界的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设与数字贸易相关的跨学科课程,注重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的培养。同时,从政府、企业、高校3个主体的角度共同推进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以满足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的人才需求。此外,通过国际合作项目和人才引进计划,促进国内外人才交流,提升中国数字贸易人才的国际化水平,通过人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快本土人才队伍的成长速度,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高地。

(四) 推进数字贸易示范区试点工作

推进数字贸易示范区试点工作是构建数字贸易生态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分支。2024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2023—2027年)》中提出:“探索数据资产管理、数字身份国际认证等,推动数字贸易交付和结算便利化,建设数字贸易服务平台。”数字贸易示范区作为创新发展的前沿阵地,能够集中展示数字贸易的最新成果和模式,为全面推广数字贸易提供宝贵的经验。试点示范区的建设,旨在通过政策引导、模式创新和环境优化,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贸易发展新模式。

数字贸易示范区的建设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通过建立数字贸易的综合服务平台,整合跨境电商、国际物流、金融支付等服务资源,打造一站式的数字贸易服务体系。同时,示范区应成为政策创新的试验田,如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的管理模式、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机制等,为全国乃至全球的数字贸易规则和管理体系提供可借鉴的经验。通过不断试验和优化,数字贸易示范区将成为推动中国数字贸易生态系统全面升级的重要引擎。

(五) 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博弈

数字贸易如今已成为国际经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不仅是全球数字贸易的积极参与者,而且在推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之一,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参与策略,不仅对国内数字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博弈中,中国需采取更为精准和主动的策略,以确保在数据流动、

跨境税收等全球博弈的焦点中维护自身利益,并促进国际贸易体系的公平与效率^[33]。

第一,中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博弈的策略应当立足于深化对数字经济规则本质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多边合作机制。中国应积极推动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参与并引领数字贸易议题的讨论,通过提出具有前瞻性和普遍性的规则框架,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贡献中国方案。

第二,中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博弈的策略应当基于开放合作的原则,反对“脱钩断链”,积极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22]。中国应积极参与到相关国际组织和多边贸易谈判中,通过建设性的对话和合作,推动形成公平、公正、透明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和区域合作,通过自贸协定等形式,推动数字贸易规则的创新和本地化实践。

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战略布局,不仅能够保护和促进国内产业的健康发展,还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推动构建更加平衡、公正的全球数字贸易新秩序。这一过程将深刻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未来格局,也将为中国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赢得有利的竞争优势。

四、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贸易活动呈现出交易主体多元化、定价机制透明化、支付体系统一化的新特征。构建一个高效、开放、安全的数字贸易生态系统,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

关键。数字贸易生态的组织机理包括4个方面,分别是平台经济模式、标准化体系构建、全球资源配置与集聚发展、塑造区域性和综合性的比较优势。构建数字贸易生态,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协同努力。在具体的建设路径方面,可以按照适度超前发展基础设施、健全标准化机制、完善配套条件和人才队伍、推进贸易示范区试点、参与全球贸易规则博弈的顺序,稳步建设数字贸易生态。结合本文研究结论,针对数字贸易生态建设工作,提出以下5点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顶层设计,明确数字贸易生态建设的战略目标和蓝图。在国家层面提高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明确提出数字贸易在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34]。制定和完善一系列支持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法规,包括但不限于跨境电子商务、数字支付、数据保护等领域的专项立法。同时,政府应推动建立统一的数字贸易标准体系,以减少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间的数字贸易壁垒,促进数字贸易的规模化和标准化发展。

第二,深化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贸易生态提供坚实的物理和技术支撑。加大对5G、物联网、云计算等关键数字技术的投入,优化网络环境,提高数据处理和传输能力。同时,鼓励企业通过建立共享平台、网络合作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升数字贸易生态的整体竞争力。

第三,重视人才培养和知识更新。通过设立数字贸易专业、提供在线和离线相结合的课程、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等方式,培

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数字技能的专业人才,为数字贸易生态的建设提供人力支持。

第四,继续支持数字贸易示范区的建设。政府出台或完善相关政策,为示范区提供税收优惠、资金支持和监管便利等激励措施,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和风险。同时,鼓励区内企业进行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加大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关键技术的投入,推动数字贸易的技术创新和应用普及。此外,数字贸易示范区应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通过构建开放、透明的贸易环境,吸引更多国内外企业参与到示范区的建设和运营中来。

第五,推动数字贸易生态的国际合作与规则协同。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推动构建公平、透明、非歧视的国际数字贸易环境。同时,通过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共同应对数字贸易中的风险和挑战,如跨境数据流动管理、网络安全应对等问题。

五、结语

本文在归纳梳理数字贸易活动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揭示了数字贸易生态的组织机理,探讨中国数字贸易生态的发展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建设数字贸易强国提供了思路启发与借鉴。本文结合数字经济规律,对数字时代的贸易生态进行梳理分析,丰富了国内数字经济生态情境下的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创新性。但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使用量

化的分析方法,使得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数据支撑,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型数字贸易情境层出不穷,可能会打破过去数字经济贸易活动的特征。本文呼吁结合生态网络化的整体性视角开展数字贸易的跨层实证研究,数字贸易生态为市场、企业带来的收益远高于单独的技术或其他生产要素带来的收益,其中的溢出收益值得关注与探讨。国内庞大的数字贸易生态下催化了大量数字创新实践,这也需要学者的持续关注与长期研究。

参考文献:

[1] 马述忠,房超,梁银锋. 数字贸易及其时代价值与研究展望[J]. 国际贸易问题,2018 (10):16-30.

[2]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和国际贸易中心. 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2024 [EB/OL]. (2024-09-26) [2024-10-27]. https://www.gdte.org.cn/content/content_8793593.html.

[3] 吴杨伟,王胜. 中国贸易优势重构:理论指导与战略支撑[J]. 世界经济研究,2017(9):65-77.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2024[EB/OL]. (2024-10-17) [2024-10-27]. https://fms.mofcom.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0364010/attach/20249/d54a62e9ce31430aa0054a1d59fc0abf.pdf?file.

[5] WEBER R H. Digital trade in WTO-law-taking stock and looking ahead [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10(5):1-24.

[6] 熊励,刘慧,刘华玲. 上海:数字与商务[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7] 李忠民,周维颖,田仲他. 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影响及对策[J]. 国际经济评论,2014 (6):131-144,8.

[8] WTO. World trade statistical review 2016 [EB/OL]. (2017-04-12) [2024-10-27].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wts2016_e/wts16_toc_e.htm.

[9] 李万利,潘文东,袁凯彬.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9):5-25.

[10]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B/OL]. (2024-03-22) [2024-10-27]. <https://www.cnnic.cn/NMediaFile/2024/0325/MAIN1711355296414FIQ9XKZV63.pdf>.

[11] 陈维涛,朱柿颖. 数字贸易理论与规则研究进展[J]. 经济学动态,2019(9):114-126.

[12] 卡尔·夏皮罗,哈尔·R·范里安. 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M]. 孟昭莉,牛露晴,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13] 孙杰. 从数字经济到数字贸易:内涵、特征、规则与影响[J]. 国际经贸探索,2020(5):87-98.

[14] 孙晋. 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J]. 中国社会科学,2021(5):101-127,206-207.

[15] TEECE D J. Profiting from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nabling technologies, standards, and licensing models in the wireless world [J]. Research policy,2018(8):1367-1387.

[16] EVANS P C, GAWER A. 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enterprise: a global survey [J]. The emerging platform economy series,2016(1):1-30.

[17] ROCHET J C, TIROLE J. Platform competition

- in two-sided markets[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3(4):990-1029.
- [18] LI J, CHEN L, YI J, et al. Ecosystem-specific advantages in international digital commerc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9, 50:1448-1463.
- [19] 刘洋,董久钰,魏江. 数字创新管理:理论框架与未来研究[J]. 管理世界, 2020(7):198-217, 219.
- [20] KEMP S. Digital 2024: 5 billion social media users[EB/OL]. (2024-01-31) [2024-10-27]. <https://wearesocial.com/cn/blog/2024/01/digital-2024-5-billion-social-media-users/>.
- [21] 黄鹏,陈靓. 数字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与规则构建:基于要素流动理论的视角[J]. 世界经济研究, 2021(3):3-13, 134.
- [22] 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 [EB/OL]. (2016-02-24) [2024-10-27].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business%20functions/mckinsey%20digital/our%20insights/digital%20globalization%20the%20new%20era%20of%20global%20flows/mgi-digital-globalization-full-report.pdf>.
- [23] 史丹,聂新伟,齐飞. 数字经济全球化:技术竞争、规则博弈与中国选择[J]. 管理世界, 2023(9):1-15.
- [24] MELTZER J P. Governing digital trade [J]. World trade review, 2019(1):23-48.
- [25] 盛斌,高疆. 超越传统贸易:数字贸易的内涵、特征与影响[J]. 国外社会科学, 2020(4):18-32.
- [26] 李俊,范羽晴.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背景下我国发展数字贸易的战略思考[J]. 国际经贸, 2023(6):14-24.
- [27] 戴翔,林益安,王昱涵. 数字贸易强国:理论、指标及测度[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4(1):96-108.
- [28] 智研咨询. 2018 年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现状及规模预测[EB/OL]. (2018-05-12) [2024-10-27].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805/640178.html>.
- [29] 张劲. 数字基础设施、新质生产力与城乡共同富裕[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4(10):128-133.
- [30] 徐金海,周蓉蓉. 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发展趋势、国际经验与政策建议[J]. 国际贸易, 2019(6):61-68.
- [31] 阙天舒,王子玥.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J]. 国际安全研究, 2022(1):130-154, 158.
- [32] 徐金海,夏杰长. 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数字贸易发展:战略定位与中国路径[J]. 改革, 2020(5):58-67.
- [33] 肖宇,夏杰长. 数字贸易的全球规则博弈及中国应对[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3):49-64.
- [34] 刘洪愧. 数字贸易发展的经济效应与推进方略[J]. 改革, 2020(3):40-52.

(责任编辑:王佳)